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曾永義
主編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三 編 第 9 冊

楊萬里《天問天對解》研究

謝惠懿 著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三 編

曾 永 義 主編

第9冊

楊萬里《天問天對解》研究

謝 惠 懿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楊萬里《天問天對解》研究／謝惠懿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100〕

目 2+176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三編：第9冊）

ISBN：978-986-254-551-5（精裝）

1.（宋）楊萬里 2.傳記 3.學術思想 4.文學評論

820.8

100015001

ISBN-978-986-254-551-5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三 編 第 九 冊

ISBN：978-986-254-551-5

楊萬里《天問天對解》研究

作 者 謝惠懿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1 年 9 月

定 價 三編 30 冊（精裝）新台幣 4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楊萬里《天問天對解》研究

謝惠懿 著

作者簡介

謝惠鏊，1969年4月8日生，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並為佛光大學文學所碩士。目前已婚，育有一子，並任教於光仁中學。

擔任教職迄今業已十七載。在“教，然後知不足”的情況下，於是選擇在職進修，雖然辛苦，但卻是求學的歷程中最大的收穫！感謝恩師陳煒舜的提攜，他不僅是一位學問淵博的經師，更是一位和藹可親的人師，使我不只在學問上的累積，更是我生活上的典範！

由於恩師的鼓勵和肯定，以及潘美月老師所給予的機會，使我有這次出版的榮幸，一切感激，點滴在心！並期許自己也要“昂首闊步迎未來，邁向卓越上巔峰”！

提 要

楊萬里為南宋中興四大詩人之一，其獨創的「誠齋體」，對後世有著深切的影響。關於誠齋體的研究不勝枚舉，其詩名也愈益顯揚，相對之下，其他文體的作品更湮沒在盛名的牽累中。楊萬里的詩作高達二萬餘首，是宋代的多產作家，而現存仍約有四千多首，數量冠於其他作品。然尚有其他著作，包括詞、賦及各散文，研究者寥寥可數，實為可惜。

楊萬里的《誠齋易傳》是其易學代表作，相關哲學著作除此之外，尚有《庸言》和《天問天對解》。令人歎惋的是，後人對《天問天對解》的看法多涵游在哲學的思想中。千古以前，屈原的《天問》被視為是《楚辭》作品中富於思想但文學價值最低，而柳宗元的《天對》後人又因文字艱澀古奧而不明文義，更遑論對其文學價值的探討。而楊萬里的《天問天對解》則是對《天問》和《天對》加以注解，從《天問》的角度詮釋著《天對》的意蘊，又從《天對》的理解中，去深思《天問》的問題。如此豐富的思維，易使人忽略其作為一個文學家的特質，故本論文特出於思想性的探討之外，更不揣淺陋地從文本析論其文學價值和特色，冀使人能褪去舊有的僵化思維，對於《天問天對解》能有嶄新認識。

《天問天對解》並沒有確切寫作年代，故筆者通過對楊萬里生平及經歷的了解，以及其理學思維、文學思想的呈現，以便知其對《楚辭》或屈原，還有對柳宗元的理解和認知。再結合外在環境因素的探討，包括政治、書院制度、當代思潮、社會經濟和文學發展的面向，並進一步深入其內在的心境，以和屈原、柳宗元心靈契合，藉此經緯交織成網，以尋繹出較可能的寫作年代。接著，從文本析論其訓解方式，從而歸納出和《天問》、《天對》的關係。尤其宋代對於楚辭學的態度，從洪興祖的《楚辭補注》到朱熹的《楚辭集注》，正是當代治學的轉變：從考據走到義理。而從楊萬里的《天問天對解》的訓解方式，可知正是此過渡期的表現。

《天問天對解》雖名之為解，形式彷彿單調，但因楊萬里能在流暢的文字中，形成自己的語言風格，在繼承前人的過程也有創發，使《天問天對解》變得靈活有致，而不拘泥在死板的注解中，這也是《天問天對解》的特色。接著，就其價值和對後世可能的影響加以探討，使對整篇論文有較完整的了解。

自古以來，注解《天問》的作品多不勝數，然對《天對》的注解，除了柳宗元的自注外，能與《天問》相互對應而有系統的注解，誠屬楊萬里《天問天對解》之作，故稱之為第一人亦實至名歸，這是他對《天問》和《天對》最大的貢獻，保存可貴的史料，且對於後人的研究有一定的影響。故本論文在有限的古籍資料中，對《天問天對解》在傳播與接受方面作一初淺的探討，盼能使楊萬里在「誠齋體」的盛名中，也能發現其他作品的豐富性。同時，也冀望能在固有思維模式中，除在哲學領域中蜻蜓點水的認識《天問天對解》之外，能更深一層地了解其所具有的文學價值和特色。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文獻分析	3
第三節 研究方法	15
第二章 楊萬里生平著作及思想	19
第一節 楊萬里之生平	19
第二節 楊萬里之著作	27
第三節 楊萬里之理學思想	31
第四節 楊萬里之文學思想	36
第三章 《天問天對解》之寫作背景及動機	49
第一節 《天問天對解》之寫作背景	49
第二節 《天問天對解》之寫作動機	57
第四章 《天問天對解》之訓解方式	69
第一節 楊萬里對〈天問〉之訓解方式	69
第二節 楊萬里對〈天對〉之訓解方式	87
第三節 《天問天對解》與〈天問〉〈天對〉之 關係	100
第五章 《天問天對解》之文學特色、價值及影 響	109
第一節 《天問天對解》之文學特色	109
第二節 《天問天對解》之價值	126
第三節 《天問天對解》之影響	135
第六章 結 論	141
第一節 研究成果	142
第二節 未來展望	147
附 錄	149
參考書目	157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南宋詩壇四大家之一的楊萬里，字廷秀，號誠齋，吉州吉水人。生於高宗建炎元年（1127），卒於寧宗開禧二年（1206），享年八十歲。一生歷經高宗、孝宗、光宗和寧宗四朝，為高宗紹興甲戌（1154）進士，官至寶謨閣學士，卒諡文節，學者稱為誠齋先生。其畢生豐富的作品，由其子楊長孺掇拾收編為《誠齋集》，於宋端平元年（1234）刊行。

楊萬里以詩聞名於當世，特別是其所創的「誠齋體」，對後世影響不小。陸游在〈楊廷秀寄南海集〉一詩中云：「俗子與人隔塵劫，何翅相逢風馬牛。夜讀楊卿南海句，始知天下有高流……」（註1）楊萬里曾自編詩集共九集，每一集皆按時間編排，此《南海集》應作於廣東為官的時候。此段多為紀行詩，但詩中形象鮮明，想像奇特。故陸游盛讚其詩清新高遠，在〈謝王子林判院惠詩編王從楊廷秀甚久〉一詩中也嘆到：「文章有定價，議論有至公。我不如誠齋，此評天下同。」（註2）充分展現楊萬里詩名已在當時流傳，並獲肯定。又清陳經禮〈偶論宋詩十絕句〉之七：「誠齋清節迥崑崙，詩筆縱橫納海潮。若學謫仙流率易，終餘俊語壓尤蕭。」（註3）直接點出其出奇不群之特色，更

〔註1〕〔宋〕陸游，《劍南詩稿》（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6年），卷19，頁21b。

〔註2〕同前註，卷53，頁1b。

〔註3〕郭紹虞、錢仲聯、王蘧常編，《萬首論詩絕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443。

勝尤袤和蕭德藻。今人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中，亦頗為讚賞楊萬里的誠齋體。〔註4〕雖白雲蒼狗，但其詩在時代變遷中，仍佔有舉足輕重之地位。無怪乎古往今來，研究其詩之學者，不可勝數。

試觀學者研究楊萬里的作品，多集中在其詩作一項。其著作之豐富，創作有二萬餘首詩，現存約四千餘首。雖所存僅有五分之一，卻是自古至今眾學者所傾注全力研究之範疇。或論其「誠齋體」的思想淵源及形成；或析其詩取材內容之豐富，因而有山水詩、童趣詩、詠園詩、諷刺詩等之剖析；或考其詩歌語言藝術，從其用字（動態助詞、副詞）和句型著手，探求寫作方式；或究其詩歌之特色：「活法」、〔註5〕「透脫」，使「誠齋體」特色更加顯明；或從與他人作品之比較，凸顯其繼承或創新的關係；或論其詩所反映的思想，包括理學、禪學等，使其詩的意境更加深化了。另外，在《誠齋集》之外的逸詩和文章，近人也多加挖掘闡發，使能錦上添花！整體而言，對其詩的研究，可謂鉅細靡遺，在在顯示其在詩壇屹立不搖的地位。然詩名愈盛，相形之下，其他文體（包括詞、賦和散文）的研究顯得寥寥可數，若有所論述，也多是從大範圍著手，難有像詩領域的澎湃氣勢，有失於平衡之慨。

楊萬里的人格光風霽月，在政治上耿介直言，不畏權貴；對於社會，他關心現實，同情民瘼。盼能以儒家實用之道作為經世濟民的根本，發揚理學和易學的思維，冀能指引一條國家治道可行的方向，挽救國家於頹敗存亡之際。終其一生熱愛國家，甚至臨死之遺言，仍義憤填膺。〔註6〕故張瑞君先生

〔註4〕 參考錢鍾書，《談藝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頁353。其言：「以入畫之景作畫，宜詩之事賦詩，如鋪錦增華，事半而功則倍，雖然，非拓境宇、啓山林手也。誠齋、放翁，正當以此軒輊之。人所曾言，我善言之，放翁之與古為新也；人所未言，我能言之，誠齋之化生為熟也。放翁善寫景，而誠齋擅寫生。放翁如圖畫之工筆；誠齋則如攝影之快鏡，兔起鶻落，鳶飛魚躍，稍縱即逝而及其未逝，轉瞬即改而當其未改，眼明手捷，蹤矢躡風，此誠齋之所獨也。放翁萬首，傳誦人間，而誠齋諸集孤行天壤數百年，幾乎索解人不得。」

〔註5〕 〔宋〕張鑑，《南湖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6年），卷7，頁24b。其〈携楊秘監詩一編登舟因成二絕〉一詩云：「今日何曾獨自來，船中相伴有誠齋。須知不局詩編裏，妙用方能處處皆。造化精神無盡期，跳騰踴厲即時追。目前言句知多少，罕有先生活法詩。」應是首先提出「活法」一詞者。

〔註6〕 〔元〕脫脫等撰，《宋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6年），卷433，頁24b。據本傳提到，韓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快快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

指出：「他的人格力量折服了時人，也影響了後人。」〔註7〕因此，除了以文學家視之之外，說他是政治家、理學家、哲學家，亦無不可。故近年來在此方面的研究有漸熱絡之勢。有學者探論其政治思想、社會思想，試為其一生的愛國之志解讀和詮釋；或將其定位在儒學倫理價值的重新建構者，反映在理學思想的表現上，強調不空談立論。而哲學的思維則反映在易學的探討，進一步延伸出所謂的樸素的唯物主義的觀點。楊萬里的作品除了《誠齋集》之外，尚有《誠齋易傳》，由於受其父楊芾的影響，他花了十七年鑽研《周易》，故能在易學的研究上頗有創新，絕非偶然。他強調「以古鑑今」「以史證事」，使深奧難知的《周易》，透過歷史的徵驗，更能相互印證。然而關於哲學之作，除了《誠齋易傳》外，尚有《庸言》及《天問天對解》。只可惜的是，對於《天問天對解》之作，多是在易學、哲學的討論中「蜻蜓點水」，幾乎沒有人結合從文學和思想二方面來探討之，這是筆者研究的最主要動機。

在因緣際會下，因做目錄學作業的過程中，筆者接觸到楊萬里的《天問天對解》，方知在屈原〈天問〉之外，尚有柳宗元的〈天對〉相對應。於是，筆者的學習範圍更加擴大了。因為《天問天對解》的注解，使對二位前賢的作品有更深的認識。同時，楊萬里在注解時須融會〈天問〉和〈天對〉，在理解屈原和柳宗元的觀點下互為注解，若不有深切的體認，又如何在一問一答的形式中，取得和諧的解說？此書有豐富的思維，從宇宙觀到知行觀甚至無神論，顯示楊萬里具有進步的思想和精神。且從其內容和表現的藝術形式，皆不同於其詩的取材和寫作風格，特別在其前面已有洪興祖的《楚辭補注》，如此完備而有體系的注解作品中，楊萬里如何在繼承中發展自己的創新思維，一如其詩突破困境而有其風格，筆者深信《天問天對解》也是如此。故欲以不佞之才探析《天問天對解》，盼能發潛微之幽光，令吾人對楊萬里在詩的作品之外，能有更深切的認識。

第二節 文獻分析

張瑞君在《楊萬里評傳》中提到：「宋詩出現在唐詩之後，是個大幸運。」

侂冑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韓侂冑姦臣，專權無上……」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

〔註7〕張瑞君，《楊萬里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448。

唐詩是中國古典詩歌發展的黃金階段，無論從思想內容到藝術形式都異常豐富多彩，給宋人提供了無數借鑒的東西。然而，宋詩在唐詩之後又是一個大不幸，要產生新的風格，有新的開拓實在太難了。形式已經定形不必說，詩的風格似乎也太難創新了。」〔註8〕詩歌的發展至唐已達巔峰的狀態，宋代要在黃金時代下誠屬不易。而且，詩至北宋經由蘇軾、黃庭堅的革新，加上南宋又有陸游、范成大等人經營，試想：楊萬里要在前人已開發的土地上開花結果，實屬不易。而今能立於詩壇不朽之地位，足見其高妙之藝術表現和文學思維。尤其是其創新的「誠齋體」，彷彿一股清流注入，成為眾人所爭相研究的範疇。也無怪乎在張毅所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 宋代文學研究》專闢〈楊萬里及其「誠齋體」〉一節，深入介紹了二十世紀對楊萬里有關之研究論文或著作，其中包含了「楊萬里的家世、交游及著述」、「『誠齋體』及其『活法』」、「楊萬里詩歌創作的藝術淵源及影響」及「楊萬里的詩論」等各方面的討論，〔註9〕列舉多位學者研究的成果，說明了楊萬里對中國文學史上具有一定的影響。至於其他學者們也紛從「誠齋體」的外在形式、特色或內在精神加以探論，如楊理論〈「誠齋體」的形成與杜詩的內在關聯〉、〔註10〕李勝〈試論「誠齋體」的創作主要素〉〔註11〕等論其形成的由來；韓梅〈論「誠齋體」山水詩的世俗化傾向〉、〔註12〕蔣安君〈誠齋體自然山水詩的創新意義〉、〔註13〕王星琦〈「誠齋體」與「活法」詩論〉〔註14〕等，則從「誠齋體」的內容析論其詩作，試循出其特色。而郭豔華〈「格物致知」和「誠齋體」——理學、禪學對楊萬里文學思想的影響〉、〔註15〕宋皓琨〈理學對誠齋體的負

〔註8〕 同前註，頁105。

〔註9〕 張毅，《宋代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下冊，頁1034～1052。

〔註10〕 楊理論，〈「誠齋體」的形成與杜詩的內在關聯〉，《社會科學家》，第3期（2006年3月），頁22～24轉35。

〔註11〕 李勝，〈試論「誠齋體」的創立要素〉，《重慶教育學院學報》，第15卷第1期（2002年1月），頁35～37。

〔註12〕 韓梅，〈論「誠齋體」山水詩的世俗化傾向〉，《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7年1月），頁74～77。

〔註13〕 蔣安君，〈誠齋體自然山水詩的創新意義〉，《棗莊學院學報》，第21卷第6期（2004年12月），頁18～19。

〔註14〕 王星琦，〈「誠齋體」與「活法」詩論〉，《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第3期（2002年9月），頁96～103。

〔註15〕 郭豔華，〈「格物致知」對「誠齋體」詩學品格的影響探析〉，《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1期（2006年1月），頁55～58。

面影響》〔註16〕等，則又從其內在蘊涵論其思想之博采；周建軍〈論「誠齋體」對南宋詩風的轉關作用〉、〔註17〕張瑞君〈楊萬里在宋代詩歌發展中的地位及影響〉〔註18〕等，又大範圍論其對當世的影響，凸顯其價值地位。從筆者找尋關於楊萬里研究的篇什中，約有三分之二論及其詩，包括藝術語言、字詞用法、甚至對整個詩壇的影響。研究其詩的項目五花八門，直是不勝枚舉，可見其在詩壇有著不可磨滅的地位。但也因為詩名太盛而掩去其文，以致於有關其他作品的研究仍是屈指可數。

筆者參考蕭瑞峰、彭庭松的〈百年來楊萬里研究述評〉及〈第二屆全國楊萬里學術討論會〉之綜合結論，再將百年來對楊萬里的研究加以分類，分為以下幾個面向：

一、關於楊萬里生平、家世、交游及詩風、文獻考輯

所謂「知人論世」，欲知其人必先了解其成長的過程，包括人事物的接觸，透過背景的探討，使解讀作品有更深的認識。源宗的〈楊姓的祖先在哪裏〉一文，特將楊姓的起源分成出自姬姓、出自賜姓、出自他姓改姓及出自他族改姓。顯然地，楊萬里的祖先應來自姬姓，使我們對其家世的淵源有更深的認識。其後裔楊潤生在〈楊萬里家世考〉、〈楊萬里始祖楊輅世系考辨〉等文敘述其一世祖至十二世。在張瑞君的《楊萬里評述》中亦附錄楊潤生的〈楊萬里家世表〉，可以清楚直觀其家世脈絡。而劉文源〈楊萬里和吉水楊氏家族〉一文，又特將楊萬里和族人的互動介紹，彼此以詩風相輔相成。鄭曉江〈映日荷花別樣紅——訪大詩人、理學家楊萬里故里〉一文則實地參訪故居，從《楊氏族譜》的記載知道，其先祖楊輅如何從北方到南方定居，並敘及「瀝塘」的由來，也為楊萬里出生地更添色彩，饒富趣味。在于北山《楊萬里年譜》一書中，記載〈譜主交遊考略〉，共輯錄其師王庭珪、張浚、胡銓和周必大、陸游、蕭德藻等友人共三十二位。〔註19〕俾使我們在研究楊萬里的人格

〔註16〕 宋皓琨，〈理學對誠齋體負面的影響〉，《棗莊學院學報》，第23卷第6期（2006年12月），頁66～67。

〔註17〕 周建軍，〈論「誠齋體」對南宋詩風的轉關作用〉，《廣西社會科學》，第3期（2003年3月），頁134～136。

〔註18〕 張瑞君，〈楊萬里在宋代詩歌發展中的地位及影響〉，《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2期（2001年4月），頁41～45。

〔註19〕 于北山著、于蘊生整理，《楊萬里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中，亦透過其師友現其端倪。而胡明珽的《楊萬里詩評述》亦列〈交遊〉一節，描寫作者的交友狀況和影響。〔註20〕另外，楊萬里的作品除了《誠齋集》之外，尚有許多未列入的創作，例如蕭東海在〈楊萬里《誠齋策問》年代背景考述〉一文，考定此25篇策問先是進士策試，後是楊萬里應張浚薦舉「賢良方正」時所作的。〔註21〕又如龍震球據《永州府志》、《零陵縣志》得詩四首和文一篇，〔註22〕使楊萬里的作品更加齊備，尚有其他論文，不及備載。

二、關於楊萬里的政治、史學、哲學思想之研究

楊萬里一向關心國家前途，受其父和師友影響（特別是張浚），在政治立場總是持著「抗金」的態度，但也因此受挫連連。畢竟其歷經四代，只有孝宗稍有恢復之雄心，可惜不能堅持，以致「主和派」仍主導整個南宋。故其在遺囑中提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註23〕足見其內心的悲憤。李勇在〈楊萬里對王安石變法的批評〉一文中提到：楊萬里對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加以批判，亦反對盡復古法。又認為治國在用人——「近賢臣遠小人」，以及興天下之利，方是變法的主要目的和原則。〔註24〕其又在〈有弊當革、革弊宜慎——談楊萬里社會變革觀〉一文，闡述楊萬里認為社會發展至某一程度，必有弊端，倘若嚴重到影響社會的安危和進步時，必須改革。〔註25〕楊萬里認為歷史是會變的，以古今相較，在器物、政治制度，甚至意識形態方面皆有所差異，故處理現實的問題亦得有所因應，於是「變」便產生了。的確，綜觀歷史的演變，「窮必革」，改革是必然的過程，其目的是為了使國家和社會更好，一切才有意義。然變革亦是不得已的，故「聖人懼於革」。因此，謹慎是最基本

頁675。

〔註20〕胡明珽，《楊萬里詩評述》（台北：學海出版社，1976年），頁45～55。

〔註21〕蕭東海，〈楊萬里《誠齋策問》年代背景考述〉，《吉安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20卷第2期（1999年4月），頁7～11。

〔註22〕蕭瑞峰、彭庭松，〈百年來楊萬里研究述評〉，《文學評論》，（2006年4月），頁197。

〔註23〕〔元〕脫脫等撰，《宋史》，卷433，頁24b。

〔註24〕李勇，〈楊萬里對王安石變法的批評〉，《淮北煤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1998年3月），頁76。

〔註25〕李勇，〈有弊當革、革弊宜慎——談楊萬里社會變革觀〉，《歷史教學問題》，第2期（1998年），頁37。

的指導原則。〔註 26〕只是，對政治的熱情亦有消退之勢，在黃小蓉〈楊萬里政治心態解構的原因〉一文中，其強調楊萬里的詩作中多有接觸自然，表現其豁達的思想和自由的人格等「透脫」特質，其實是來自於南宋苟且偷安的腐敗的社會為前提下的產物。〔註 27〕且認為出入理學和審美情趣改變，是使其轉向大自然以追求內在心靈的原因之一了。楊萬里對國家的熱烈關注，曾上了《千慮策》，〔註 28〕卻未被採納；而朝廷歷來又是主和派熾盛囂張，就連帝王皆如此，故對政治的熱情勢必因此而減弱。只是其並非選擇耽溺於聲色享樂，而是轉向徜徉大自然，關懷市井小民的生活，故其對生命仍持有熱度。至於哲學方面，表現最明顯的則是《誠齋易傳》的研究。張瑞君在《楊萬里評傳》中獨列一節〈楊萬里的易學思想〉，除了對淵源的探討和朱陸的易學比較外，亦特別著力在《誠齋易傳》的介紹，提出此書之特點：《周易》是「聖人通變之書」、「古為今用」、「以史證易」、「易之道天理而已」、「注重外在引申，不注重文本闡釋」、「理學家的色彩」等。〔註 29〕而張文修亦對其《誠齋易傳》加以研究，進一步探討楊萬里建立以「中正」為原則，而根源於天理的一套意義世界的學說。〔註 30〕衷爾鉅也從理學角度和哲學思維，探論楊萬里的唯物思想，其中對《天問天對解》有較為整體性的析論：楊萬里發揮柳宗元、張載、王安石等人唯物思想，以為天地萬物皆本於元氣之說。〔註 31〕因此，在注解時，亦繼承和發揮此種思想。試舉例如下：

〈問〉曰：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圓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對〉曰：

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无營以成，沓陽而九。

〔註 26〕李勇，〈楊萬里的歷史通變思想〉，《史學史研究》，第 3 期（1998 年），頁 39。

〔註 27〕黃小蓉，〈楊萬里政治心態解構的原因〉，《宜春師專學報》，第 21 卷第 6 期（1999 年 12 月），頁 22。

〔註 28〕胡明珽，〈楊萬里詩評述〉，頁 37。其在〈楊萬里傳——思想〉說到：「夫讀誠齋之詩，未讀誠齋之千慮策者，則未能識誠齋之人之全，遂亦不能知識齋之人之高且大也。」對此作之精闢見解，予以肯定。

〔註 29〕張瑞君，〈楊萬里評傳〉，頁 351～385。

〔註 30〕張文修，〈《誠齋易傳》的歷史與意義的世界——楊萬里易學思想研究〉，《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8 卷第 5 期（2004 年 9 月），頁 18。

〔註 31〕衷爾鉅，〈論楊萬里的唯物思想〉，《南昌大學學報（人社版）》，第 32 卷第 1 期（2001 年 1 月），頁 131～132。

轉輾渾淪，蒙以圓號。冥凝玄釐，无功无作。

《天問天對解》：

陽陰之合以三，而元氣統之以一。炎者，元氣之吁也；冷者，元氣之吹也。吁而吹，吹而吁，炎而寒，寒而炎，交錯而自爾功者也，其始無本，其末無化。天之九重者，陽數之合，沓而積者爾。天之圓體者，一氣之轉輪而渾茫者爾。烏有所營？烏有所度哉？……〔註32〕

楊萬里繼承了柳宗元的元氣論之外，並進一步衍生出無神論的思想。故在屈原問及「萍號起雨，何以興之？」他也發揮柳宗元的看法，是「陰陽蒸炊而雨」，否定是雨師神通廣大，呼號所致。又在「伯強何處？惠氣安在？」的回答上，從柳宗元的觀點上闡述「伯強緣厲氣而屈，惠氣以厲氣而縮者也。惠氣以和順而屈，伯強緣和順而縮者也，莫非一氣也，又烏有伯強居處之鄉？」明白地表示天地之間、宇宙萬物，多是陰陽二氣的作用，非有鬼神作怪所致。

〔註33〕

三、關於文學創作及文學思想之研究

張瑞君在《楊萬里評傳》一書中，特列〈楊萬里的文學思想〉一節，楊萬里認為文學需具有社會功用，方能作為經世濟民的媒介，如同儒學的功用應在於實用性，要能「為時所用」。如此，對社會方有所助益。接著，探討其文學的創作動機：提到楊萬里強調詩需把握「有感而發」的原則，強調「觸發」功夫，方能有創作衝動的產生。所謂「大抵詩之作也，興，上也；賦，次也；賡和，不得已也……」，〔註34〕其次，論敘其對文學風格的看法：重神輕形、要求妙悟透脫，為文注重「文如其人」……接著，探論其在文學的繼承和創新。楊萬里初學江西詩派，後亦吸收晚唐的詩風，又融入蘇黃的精華，最後創發了「誠齋體」，獨樹一格，在繼承之中脫穎而出（相關研究，前已陳述）。至於對批評鑒賞方面，提到楊萬里「反對奇險」，要求「公正客觀」之原則。〔註35〕此一章節雖然豐富，但仍從詩的角度論述，對於其他文體，並未詳細論述，總有缺漏！楊萬里的作品其實很豐富，除了詩作之外，

〔註32〕〔宋〕楊萬里，《誠齋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編四部叢刊初編縮本縮印日本宋鈔本，1968年），卷95，頁821～822。

〔註33〕袁爾鉅，〈論楊萬里的唯物思想〉，頁134～136。

〔註34〕〔宋〕楊萬里，《誠齋集》，卷67，頁555。

〔註35〕張瑞君，《楊萬里評傳》，頁397～444。

尚有詞、賦、散文……如能旁及其他介紹，必然更加完備，對楊萬里也較有全面的了解。

另外，文師華、胡建升的〈論楊萬里文賦的三維構建〉一文中，認為楊萬里重視文學的本質——實用性，要能經邦治國，教化社會，裨益人世。誠如《典論論文》：「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世。」〔註36〕他的文章載入道德的價值觀，欲使文有「味外之味」。然在「味外之味」的道德理念中，也強調獨抒性靈的重要。同時，文章需在參透中有所「妙悟」，作者認為是和宋人好學禪有關。故楊萬里的文賦中，也浸潤了對禪境的追求。〔註37〕而韓經太也認為楊萬里的文學是在理學的建構中發展出自己的特點，除了道德的涵養之外，美刺和妙悟亦不可少。〔註38〕

近年來，有關楊萬里和他人的比較研究也有增加之趨勢。葉幫義〈20世紀對陸游和楊萬里詩歌研究綜述〉、歐純純〈陸游與楊萬里詠梅詩比較研究〉、張瑞君〈劉克莊與陸游楊萬里詩歌的繼承關係〉等篇，多從詩歌作品論述二位詩人的特色，甚至在詩壇的地位；而黃惠運亦撰寫〈英雄和詩人：楊邦乂和楊萬里〉一文，對和同族的愛國者進行比較。于北山《楊萬里年譜》記載：「建炎三年，十一月，金帥完顏宗弼陷建康府，守臣等迎拜；通判楊邦乂拒之，罵敵不屈，為宗弼所殺。邦乂字希稷，誠齋族叔祖也。」〔註39〕不難想見在族人的忠烈氣節中，楊萬里所受的影響和繼承，反映在其人格氣質上、政治的態度，甚至對文學的表現。另有吳中勝〈簡齋和誠齋〉、徐房明〈誠論劉過與楊萬里的兩次相見〉等文，亦從比較中看到楊萬里的人格。

四、關於《天問天對解》和〈天問〉〈天對〉關係之研究

一件文學作品的產生，不外乎和作者的內在及外在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故作者內在的性格和感情，以及外在的時代背景、社會環境和身世經歷，必是形成創作作品的基礎。陳怡良在〈〈天問〉的思想內容及其文學價值〉一

〔註36〕〔元〕郝經，《續後漢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6年），卷66下上，頁7a。

〔註37〕文師華、胡建升，〈論楊萬里文賦的三維構建〉，《江西社會科學》，第4期（2004年4月），頁221～225。

〔註38〕韓經太，〈楊萬里出入理學的文學思想〉，《社會科學戰線》，第2期（1996年2月），頁218。

〔註39〕于北山著、于蘊生整理，《楊萬里年譜》，頁10。

文中提到：「任何文學作品，必然受到時代背景及當代思潮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因此我們要衡量某一文學作品的真實價值，必然先瞭解作者的思想、感情、個性，及作品的創作背景、創作動機，否則我們就很難予作品有一正確而客觀的評價。」〔註40〕又司馬遷在其〈太史公自序〉中，曾列舉許多古人的作品多是在作者身處在困頓蹇塞之時完成的：「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註41〕所謂「生於憂患」之故。因此，我們欲明瞭《天問天對解》和〈天問〉、〈天對〉的關係，可以從作者的內在和外在的因素來探討，同中求異，異中求同，多少可看出梗概。

明代時，《天問天對解》已有單行本的刊行。而最早的版本，應是崇禎十年（1637）古香齋刻本（南京圖書館藏）。而當代也有專文討論，例如張燮〈刻楊氏天解序〉和陳朝輔〈刻天解引〉。張燮以為〈天問〉之作，有「豎義」作用，而柳宗元的〈天對〉乃「牢愁自放，故託天口，與屈子相酬酢。擢繭成絲，端竟自在，亦若經著而傳隨耳」。〔註42〕雖有〈天對〉對應〈天問〉，但長久以來是二者單行，直至楊萬里「始參錯之，分壘就班，遞相呼應。又為之釋義以行，末學不至艱於披展矣」。〔註43〕而陳朝輔在〈刻天解引〉中亦認為「自廬陵楊誠齋先生字比句櫛，剖殆鉤玄，然後燦若列眉。問奇者不沒其苦心，斟若畫一；汲古者亦得修綆。視河東為三閭之忠臣，廬陵又三閭河東之功臣也」。〔註44〕對《天問天對解》給予極高的評價。同時，也將屈原、柳宗元和楊萬里的關係作一簡要的說明。使我們對於了解《天問天對解》和〈天問〉、〈天對〉的關係，有所幫助。

張國棟〈從〈天問〉〈天對〉看屈原與柳宗元的貶謫心態〉一文中提到：「屈原因受讒見棄而有『呵壁』之作，柳宗元因政治黜貶而有呼應之篇，二人於類似的貶謫境地中表現出了不同的心態反映，最終成就了卓然獨立的詩人屈原與冷峭峻潔的思想家柳宗元。」〔註45〕姑且不論〈天問〉是否是「呵壁」之作，就其個人遭遇和寫作的動機而言，兩人同樣有抒懷憂憤之情。屈

〔註40〕 陳怡良，《屈原文學論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頁326～327。

〔註41〕 〔漢〕司馬遷，《史記》（台北：七略出版社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景印，1985年），頁1353。

〔註42〕 崔富章，《楚辭書目五種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45。

〔註43〕 同前註。

〔註44〕 同前註，頁46。

〔註45〕 張國棟，〈從〈天問〉〈天對〉看屈原與柳宗元的貶謫心態〉，《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17卷第3期（2007年9月），頁4。

原被疏於漢北，深怕楚國處於狼虎強秦的利誘威逼下而導致亡國，故〈天問〉中亦列舉三代興衰史實以作為楚國之借鑑；柳宗元在王叔文等人的帶領下，欲改革時弊挽救唐帝國於頹然之際，只是改革失敗了，成為「眾矢之的」，貶謫永州。因感受和屈原同樣的處境，故作〈天對〉以回應。雖所處的時代特徵不同，但其為國之心昭然可見。但兩人畢竟在現實的社會環境和性格上有所差異，因此選擇自處的方式亦不相同。屈原性情較為奔放熱烈，從其寫作〈天問〉，連問一百七十多個問題的龐大體製中，不難窺見其澎湃的情感。故最後以激進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形成永恆悲劇；而柳宗元則是個性較為內斂，在貶永州的十年中，慢慢藉由大自然紓解了內心的壓抑，然對貶謫此地的生命衝擊體驗並未能徹底消除，故仍有所期待。只是，在回京愉快心情的面紗下，接踵而至的是被貶至更遙遠的柳州，無奈之情，油然而生。但無論如何，他選擇的方式不同於屈原，也代表在追慕屈原的過程中，其仍有自己的見解，故在〈天對〉末尾時充分顯露柳宗元「同中有異」的看法：雖對屈原身處禮義消亡之時有所同情，但是「合行違匿固若所，咿嚶忿毒意誰與？」也表達其不為苟同的態度，積極作為可能剩過興詞怨憤較好。因此，在最後二句話「誠若名不尙，曷極而辭？」更是對屈原之「尚名」提出質疑。

楊萬里所處的時代又不同於二位賢人，北宋的積弱不振導致「靖康之恥」，南宋國君又受便佞之臣影響，終苟安江南，無恢復之意。政治環境不利於那些愛國的知識份子，憂心如焚，殫心竭慮，理想終不得實現。剛直的性格造成其在仕途上的多舛，故在其詩中也慢慢出現「仕」與「隱」的矛盾。所不同於屈原和柳宗元的是，楊萬里選擇了辭官退隱。也許，其在注解〈天問〉和〈天對〉更有所感慨：南宋的情況似乎亦如楚國之危險？以史印證事理，盼可以作為君臣之借鏡。

近人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及崔富章《楚辭書目五種續編》皆有《天問天對解》的提要介紹，特別針對是書之著錄、版本和序跋的刊載。另外，尚有潘嘯龍、毛慶主編的《楚辭著作提要》和洪湛侯編的《楚辭要籍解題》。此二書的著作形式不同於前者，除了對版本的記述外，特地撰寫提要，討論其得失。《楚辭著作提要》提到《四庫全書總目》對《天問天對解》的評價，認為是承襲〈天對〉之說，並無新意。但編者認為在繼承之外，楊萬里在注解時對文句、語詞尚能有所發明的。而《楚辭要籍解題》：「從柳宗元〈天對〉的角度詮釋〈天問〉，不僅是楊氏首倡，而且是他《天問天對解》取得一定成